

陳致／訪談

我走過的路

余英時訪談錄

- 我走過的路
- 直入塔中，上尋相輪
- 治學門徑與東西方學術
- 為了文化與社會的重建
- 宗教、哲學、國學與東西方知識系統



我
走
過
的
路

余英時

訪談錄

陳致／訪談



文化叢刊

我走過的路：余英時訪談錄

2012年6月初版

定價 新臺幣35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訪 發行人	談 陳林	載 載	致 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叢書主編	沙淑芬	
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校對	吳美滿	
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整體設計	江宜蔚	
叢書主編電話	(02) 87876242 轉 212			
台北聯經書房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	(02) 23620308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321號1樓			
暨門市電話	(04) 22371234 ext 5			
郵政劃撥帳戶	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	(02) 23620308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	(02) 29178022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台北聯經書房更換。 ISBN 978-957-08-4011-7 (平裝)

聯經網址 www.link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 linkng@udngroup.com

本書中文繁體字版由中華書局授權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我走過的路 余英時訪談錄/陳致訪談

初版 臺北市 聯經 2012年6月(民101年)

312面+8張彩色 14.8×21公分(文化叢刊)

ISBN 978 957 08-4011-7(平裝)

1 余英時 2 學術思想 3 史學方法 4 人文學
5 訪談

603 1

101010312

目次

我走過的路

余英時

1

直入塔中 上尋相輪

17

克魯格獎

19

政治、黨爭與宋明理學

20

清代考據學：內在理路與外部歷史條件

31

最後一位風雅之士：錢鍾書先生

42

以通馭專，由博返約：錢賓四先生

44

國學與現代學術

47

學問與性情，考據與義理

56

「直入塔中」與「史無定法」

60

「哲學的突破」與巫的傳統

64

「內向超越」

70

胡適的學位與自由之精神

76

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

84

人文邊緣化與社會擔當

86

西方漢學與中國學

91

宗教、哲學、國學與東西方知識系統

97

儒家思想的宗教性與東西方學術分類

99

國學、「國學者」與《國學季刊》

104

哲學與思想：東西方知識系統

108

哲學與抽象的問題

116

文化熱與政治運動

120

知識人：專業與業餘

125

治學門徑與東西方學術	129
哈佛讀書經驗	131
早歲啓蒙與文史基礎	134
先立其大，則小者不能奪	140
洪煨蓮（業）與楊聯陞	150
俞平伯與錢鍾書	158
學術與愛國主義	171
取法乎上	178
西方漢學與疑古問題	182
為了文化與社會的重建（劉夢溪訪談）	195
關於錢穆與新儒家	197
學術不允許有特權	202
學術紀律不能違反	205

「天人合一」的局限	208
怎樣看「文化中國」的「三個意義世界」	210
學術立足和知識分子的文化承擔	212
「經世致用」的負面影響	213
中國學術的道德傳統和知性傳統	215
中國傳統社會的「公領域」和「私領域」	217
中國歷史上的商人地位和商人精神	219
如何看待歷史上的清朝	221
東西方史學觀念和研究方法的異同	223
最要不得的是影射史學	226
文化的問題在社會	227
社會的問題在民間	228
後記	231
余英時教授著作目錄（車行健整理）	1

我走過的路

1

我求學所走過的路是很曲折的。現在讓我從童年的記憶開始，一直講到讀完研究所為止，即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六二年。這是我的學生時代的全部過程，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一九三七—一九四六年，鄉村的生活；一九四六—一九五五年，大變動中的流浪；一九五五—一九六二年，美國學院中的進修。

我變成了一個鄉下孩子

我是一九三〇年在天津出生的，從出生到一九三七年冬天，我住過北平、南京、開封、安慶等城市，但是時間都很短，記憶也很零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戰爭開始，我的生活忽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一年的初冬，大概是十月左右，我回到了祖先居住的故鄉——安徽潛山縣的官莊鄉。這是我童年記憶的開始，今天回想起來，好像還是昨天的事一樣。

讓我先介紹一下我的故鄉——潛山縣官莊鄉。這是一個離安慶不遠的鄉村，今天乘公共汽車只用四小時便可到達，但那時安慶和官莊之間還沒有公路，步行要三天。官莊是在群山環抱之中，既貧窮又閉塞，和外面的現代世

1 此文最初發表於《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十六（大阪，一九九五）。

界是完全隔絕的。官莊沒有任何現代的設備，如電燈、自來水、汽車，人們過的仍然是原始的農村生活。對於幼年的我，這個變化太大也太快了，在短短的三天之內，我頓然從一個都市的孩子變成了一個鄉下的孩子。也就從這時開始，我的記憶變得完整了，清楚了。

鄉居的記憶從第一天起便是愉快的。首先，我回到了大自然的懷抱。我的住屋前面有一道清溪，那是村民洗衣、洗米、洗菜和汲水的所在，屋後和左右都是山岡，長滿了松和杉，夏天綠蔭密布，日光從樹葉中透射過來，暑氣全消。我從七八歲到十三四歲時，曾在河邊和山上度過無數的下午和黃昏。有時候躺在濃綠覆蓋下的後山草地之上，聽鳥語蟬鳴，渾然忘我，和天地萬物打成了一片。這大概便是古人所說的「天人合一」的一種境界吧！這可以說是我童年所受的自然教育。

鄉居八九年的另一種教育可以稱之為社會教育。都市生活表面上很熱鬧，到處都是人潮，然而每個人的感覺其實都是很孤獨的。家庭是唯一的避風港，但每一個家庭又像是一座孤島，即使是左鄰右舍也未必互相往來。現代社會學家形容都市生活是「孤獨的人群」(Lonely crowd)，其實古代的都市又何嘗不然？蘇東坡詩「萬人如海一身藏」，正是說在都市的人海之

中，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但是在鄉村中，人與人之間、家與家之間都是互相聯繫的，地緣和血緣把一鄉之人都織成了一個大網。幾百年、甚至千年聚居在一村的人群，如果不是同族，也都是親戚，這種關係超越了所謂階級的意識。我的故鄉官莊，有余和劉兩個大姓，但兩姓都沒有大地主，佃農如果不是本家，便是親戚，他們有時交不出田租，也只好算了。我從來沒有見過地主凶惡討租或欺壓佃農的事。我們鄉間的秩序基本上是自治的，很少與政府發生關係。每一族都有族長、長老，他們負責維持本族的族規，偶爾有子弟犯了族規，如賭博、偷竊之類，族長和長老們便在宗祠中聚會，商議懲罰的辦法，最嚴重的犯規可以打板子。但這樣的情形也不多见，我只記得我們余姓宗祠中舉行過一次聚會，處罰了一個屢次犯規的青年子弟。中國傳統社會大體上是靠儒家的規範維繫著的，道德的力量遠在法律之上。道理（或天理）和人情是兩個最重要的標準。這一切，我當時自然是完全不懂的。但是由於我的故鄉和現代世界是隔絕的，我的八九年鄉居使我相當徹底地生活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而由生活體驗中得來的直覺了解對我以後研究中國歷史與思想有很大的幫助。現代人類學家強調在地區文化研究上，研究者必須身臨其境（being there）和親自參與（participation），我的鄉居就是一個長期的

參與過程。

現在我要談談我在鄉間所受的書本教育。我離開安慶城時，已開始上小學了。但我的故鄉官莊根本沒有現代式的學校，我的現代教育因此便中斷了。在最初五六年中，我僅斷斷續續上過三四年的私塾；這是純傳統式的教學，由一位教師帶領著十幾個年歲不同的學生讀書。因為學生的程度不同，所讀的書也不同。年紀大的可以讀《古文觀止》、四書、五經之類，年紀小而剛剛啓蒙的則讀《三字經》、《百家姓》。我開始是屬於啓蒙的一組，但後來得到老師的許可，也旁聽一些歷史故事的講解，包括《左傳》、《戰國策》等。總之，我早年的教育只限於中國古書，一切現代課程都沒有接觸過。但真正引起我讀書興趣的不是古文，而是小說。大概在十歲以前，我偶在家中找到了一部殘破的《羅通掃北》的歷史演義，讀得津津有味，雖然小說中有許多字不認識，但讀下去便慢慢猜出了字的意義。從此發展下去，我讀遍了鄉間能找得到的古典小說，包括《三國演義》、《水滸傳》、《蕩寇志》（這是反《水滸傳》的小說）、《西遊記》、《封神演義》等。我相信小說對我的幫助比經、史、古文還要大，使我終於能掌握了中國文字的規則。

我早年學寫作也是從文言開始的，私塾的老師不會寫白話文，也不喜歡白話文。雖然現代提倡文學革命的胡適和陳獨秀都是我的安徽同鄉，但我們鄉間似乎沒有人重視他們。十一二歲時，私塾的老師有一天忽然教我們寫古典詩，原來那時他正在和一位年輕的寡婦鬧戀愛，浪漫的情懷使他詩興大發。我至今還記得他寫的兩句詩：「春花似有憐才意，故傍書台綻笑腮。」詩句表面上說的是庭園中的花，真正的意思是指這位少婦偶爾來到私塾門前向他微笑。我便是這樣學會寫古典詩的。

在我十三四歲時，鄉間私塾的老師已不再教了。我只好隨著年紀大的同學到鄰縣——舒城和桐城去進中學。這些中學都是戰爭期間臨時創立的，程度很低，我僅僅學會了二十六個英文字母和一點簡單的算術。但桐城是有名的桐城派古文的發源地，那裡流行的仍然是古典詩文。所以我在這兩年中，對於中國古典的興趣更加深了，至於現代知識則依舊是一片空白。

大變動中的流浪

一九四五年八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我正在桐城。因為等待著父親接我到外面的大城市去讀書，便在桐城的親戚家中閒住著，沒有上學。第二年（一九四六）的夏天，我才和分別了九年的父親會面。這裡要補說一句：父親在戰爭時期一直在重慶，我是跟著伯父一家回到鄉間逃避戰亂的。我的父親是歷史學家，學的是西洋史，戰前在各大學任教授，一九四五年他去了瀋陽，創立了一所新的大學——東北中正大學。一九四六年六月我先到南京，再經過北平，然後去了瀋陽。

這時我已十六歲了，父親急著要我在最短時間內補修各種現代課程，準備考進大學。一九四六—一九四七這一年，我一方面在高中讀書，一方面在課外加緊跟不同的老師補習，主要是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等現代科目。我在這一年中，日夜趕修這些課程，希望一年以後可以參加大學的入學考試。我還記得，我第一次讀一篇短短的英文文字，其中便有八十多個字彙是陌生的。這時我已清楚地認識到，我大概絕不可能專修自然科學了，我只能向人文科學方面去發展。好在我的興趣已完全傾向於歷史和哲學，所以並不

覺得有什麼遺憾。一九四七年夏天，我居然考取了東北中正大學歷史系。我的治學道路也就此決定了。

戰後的中國始終沒有和平，因為緊接著便爆發國共內戰。我在一九四七年底讀完大學一年級上學期時，瀋陽已在共軍的包圍之中，我們一家乘飛機回到北平。於是我的大學生涯又中斷了。我們在北平住了十個月，然後又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從北平流亡到上海。半年多以後，上海也被共軍占領了。在這一一年半的流亡期間，我自然沒有上學的機會。

但是一九四八年在北平的十個月，我自己思想上發生了極大的波動。這是中國學生運動最激烈的階段，北平更是領導全國學運的中心。在中共地下黨員的精心策劃之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左傾」學生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大規模遊行示威。我的一位表兄當時便是北大地下黨的領導人，他不斷地向我進行說服工作，希望把我拉入「革命的陣營」。這樣一來，我的政治、社會意識便逐漸提升了，我不能對於中國的前途、甚至世界的趨勢完全置身事外。我不是在學的學生，因此從來沒有參加過左派或右派的學生活動，但是我的思想是非常活躍的，在左、右兩極間搖擺不定。我開始接觸到馬克思主義，也深入地思考有關民